犹记紫藤花下影

□蔡海波

“影影绰绰,忽然失措,数不清花瓣有几朵。”

年少时的梦,总和书有关。在那个没有网络的年代,不管是勤勉做读书笔记的优质学霸,还是抢着看篮球杂志的逃课学渣,谁没有关于图书馆的点滴回忆呢?冬日暖阳下,明眸皓齿的少女轻声读着顾城的诗歌,连玻璃窗都在安静倾听,时间似乎凝固在了蓝白相间的颜色之中,阅读将生命翻开了新的一页。银杏叶儿做书签,紫藤花瓣是伴读,老台中的图书馆多年未去,不知如今,风华几何?

老台中的图书馆最傲人处不在于藏书之多,也不在于楼堂之高,而在于馆前的几株紫藤花。淡雅如常,幽然不语,静如处子,怎为人知。知她者,先生也;先生者,朱自清。朱自清先生在六师(台州中学前身)执教之时,在校园里亲手种了一棵紫藤花。先生后来回忆道:“我曾几度在花下徘徊:那时学生都上课去了,只剩我一人。……那花真好看:一缕缕垂垂的细丝,将她们悬在那皱裂的臂上,临风婀娜,真象嘻嘻哈哈的小姑娘,真象凝状的少妇,象两颊又象双臂,象胭脂又象粉……”中学时,每每讲到朱自清先生的文章,老师们必然忆往昔繁华,数紫藤风流一番。六师(台中)之于先生,纵有千般回忆,万种情思,但也只是浮生里一朵精彩的浪花;而先生之于(六师)台中却是一杆处世与治学的标尺,百年光阴,花开无数。

谈及先生,人们总是想到《背影》、《匆匆》等散文中优美字句,或者《睡吧,小小的人》、《毁灭》等诗歌忧思静逸,抑或“不食周粟”的傲然风骨,却很少想到,先生既是优雅文人,更是严谨学者。如迅公写得一手天下第一的杂文,也著有《中国小说史略》这样业内赞许的专著;闻一多笔下的《红烛》诗意闪耀,《楚辞校补》和《唐诗杂论》也是出自诗人笔下;郭沫若的《女神》独领风骚,《屈原》称雄舞台,《卜辞通纂》研究的却是少人问津的古文字。同样,朱自清先生的《经典常谈》也是一本普及传统文化极好的册子,以浅显轻松的文字介绍了我国文化遗产中的经典作品,确实是启蒙的好读物。

朱自清先生和那个时代的学者一样,做事治学极为认真。郑振铎回忆先生在清华教学时的情形说:“每上一堂课,在他是一件大事。尽管教得很熟的教材,还是十分的紧张。记得在清华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办公室里坐着,见他紧张的在翻书。我问道:‘下一点钟有课吗?’‘有的。’他说道。”这样的民国范人物,在我们这个年代已经越来越少,偶有出现,也似孤芳自赏,不为人知。

“静静坐着,书卷翻过,落定的尘埃有几颗。”

听朋友说,台初有位语文教师因年纪大了,从一线退了下来,来到图书馆。这本是养老闲差,只消打发光阴便好。没想到她打扫房间,添置物品,将她已故先生积累了几十年的杂志捐给学校,并修补整理好,建了一个阅览室兼资料室,供其他教师查阅用。室内窗明几净,墨香淡淡,加之还有清茶可饮,真是一个读书的好去处。如今的临海,似乎已经找不到几家像样的书店,更何况是可以让人安心阅读的去所。人们似乎习惯了随波逐流,安逸躲懒,不愿去改变或是抗争。这个老教师,守着那堆杂志,守着几株紫藤,是不是希望守住台中人的精神,希望更多的学人能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不忘延续当年朱先生亲手栽下的紫藤花的芬芳吧?

“谁料一阵风吹过,吹乱红的绿的,许多年后才发现竟是一种颜色。”

时代的才女和她们的书(之五)

——读张爱玲·《十八春》

□乐 之

许是我本人有民国情结,尤其是对旧上海时代,有着情意千千结。十里洋场,像一本泛黄的相册,黑白映像,翻开的第一眼,看到的总是那个身着华丽旗袍,一支素手扶着腰,倨傲地仰着头,眼神里尽是桀骜,高贵里还藏着悲凉的女子。是的,她就是张爱玲,一个时代的传奇。她是我第一喜欢的才女,犀利又悲凉的文字里常有吴越方言使人倍觉亲切,倾尽全力喜欢一个不堪的男人只因他曾懂她,同时面对着灿烂夺目的喧闹和最极度的孤寂,成为一个时代的异数和标榜,在旧上海一炉又一炉的沉香屑里,她永远是那第一炉香。

文艺青年大多爱读张爱玲的小说,尤其是天生就爱小资情调的文艺女青年,太平盛世,风和日丽,总在幻想经历一场动荡的悲凉。悲凉,是张爱玲作品里最大的特点。所有的悲欢离合,总伴随着那薄雾般缭绕不散的悲凉。读张爱玲,大抵分为三个阶段,是为三炉香。第一炉香,燃在那个情窦初开的年岁,读得似懂非懂,只看见了一袭华丽的长袍,和炖在炉上那种朦朦胧胧的旧上海的小资,空气中氤氲着咖啡香,弥漫开来,花非花雾非雾。第二炉香,焚的是无数的感慨,怎么就能如此洞察世故呢?怎么就能句句戳中心房呢?怎么就像一场香水冰雨,闻着陶醉,沁骨难熬,明明浅薄,却浓得化不开呢?第三炉香,是熏在坎坷情路的尽头,在她那里找到了共鸣,原来如此坚强、高傲的张爱玲,也驱不尽爬满的虱子;原来繁花似锦过后,是尘世的满目荒凉;原来荒凉并不总是迷离灰蒙,五光十色的斑斓里,也有温暖后的冰冷。这三炉香,总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迷蒙了若干年后你我的眼睛,那红颜沉香,竟是如此的深重。

张爱玲的小说写得尤其出色,譬如《色戒》、《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都久经不衰,但今天读的,是她第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十八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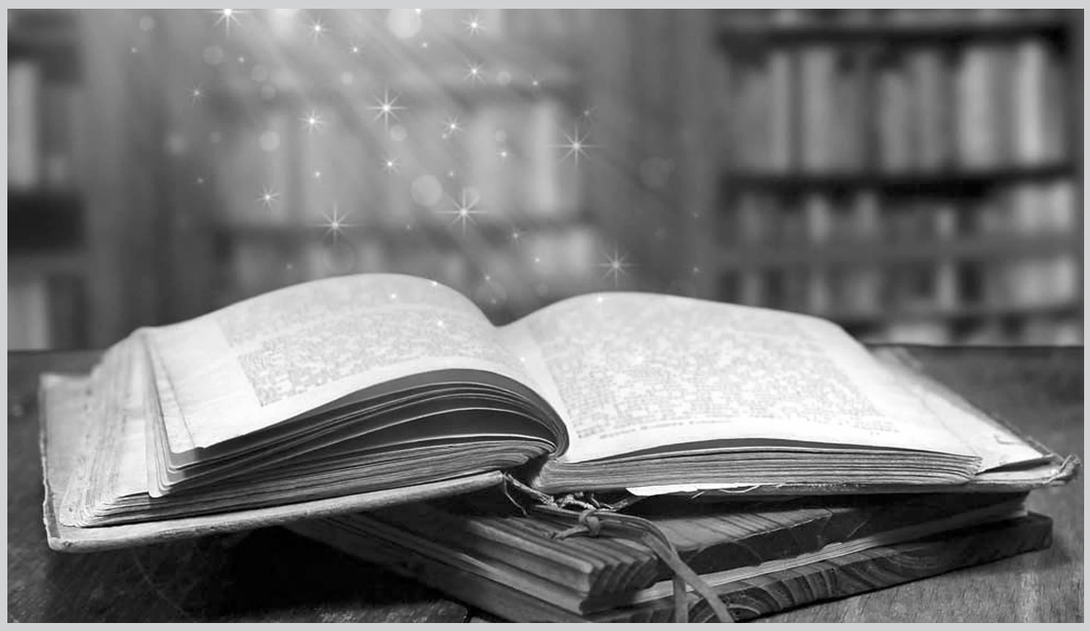
从前最开始读《十八春》的时候,恨死了曼璐,唾耻了祝鸿才,寒心了顾太太,悲鸣了曼璐与世钧,惋惜了叔惠与翠芝,恨恨地想这些叫人生恼的人,为什么不能像张爱玲那样去爱,我不管你来自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身世背景,长得美或丑,只因为你懂我,我爱你,便坚持到底。当曼桢为了荣宝,怀着绝望,近乎于自杀一般的心情嫁给祝鸿才,过着行尸走肉的生活,读者心里生出无数的感伤与痛,为什么世钧当初不够坚定,爱得不够彻底,轻易放弃了追究曼桢的下落。原来连小说都不能完满,何况生活的苦难,我们曾经以为遇见了就不会分开,相爱了就能厮守,缘分来了是命里注定,却忘了我们都只是宿命的一颗棋子。张爱玲总有这样的本事,把生活艺术化,把艺术生活化,让你感同身受,让你觉得这就是发生在你的世界里的故事,让你跟着书中的人儿走,同喜同悲,在某个时候戳痛你的心,分不清戏里戏外。她用文字让你明白世情冷暖,把苍凉人生化作声声叹息,像雨天的屋檐,你仰头看着那些雨滴,以为下一滴就完,可它总也滴不完,滴不完。

也看过改编的电视剧《半生缘》,印象最深的是蒋勤勤扮演的曼璐,临终前不久去曼桢教书的学校探访,离开时那样落寞无助的身影,看得人揪心,仿佛她的悲哀漫出了屏幕。也是因为这个画面,让我重新审视曼璐,她原本可以过得简单而幸福,同豫瑾一起过夫唱妇随的生活,可是17岁的曼璐,牺牲自己的一生去维持一家妇孺,也许她最初时有过不甘与挣扎,但终究是选择了一条注定悲剧收场的路。她是一个悲剧女人,年华老去,她无所依,家人却无法理解,认为她有碍门楣,当有一根稻草出现的时候,沉浮在苦海里的曼璐以为它能救命,于是她为了捍卫“祝太太”这个名分,把自己的悲剧延续到别人身上,偏这个人还是她一手培养的亲妹妹,曾经她也差点可以像她那样美好的妹妹。只是,有时候不禁要问,曼璐策划了曼桢的悲剧,又有谁来为她的悲剧负责。

张爱玲对于细节的处理和摆弄文字的精练已不需赘言,读来总是觉得舒畅,却又说不出具体,浑然天成就在那里,洗尽铅华后的平实,又在缝隙里渗出点点的感伤与悲凉,是看透世情后的冷眼旁观。不过还是要拣出两个句子来说,是读过这些遍《十八春》每次都耿耿于怀的句子。一是曼桢写给世钧的一封信,严格来说是一封未完成的信,那时候世钧回了南京,曼桢在办公室给世钧写信,叮嘱他这样那样,信还没写好,她便急急地盖了起来,因为世钧毫无征兆地出现在她身边,她又喜又窘,觉得难为情极了,即便她与世钧已经那样好,可赤裸裸的情话总令少女羞涩,好在世钧放在口袋里没有当场就拿来看。信的内容,是多年后世钧在亭子里翻到一本旧书时,发现了夹在书里的,唯一遗留下来的这封未完的情书,我们才得以读到。我要拣出的第一句,就是信的结尾,曼桢写:我要你知道,这世界上有一个人是永远等着你的,不管是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反正你知道,总有这么个人。我想无数爱过的人看到这句话,都会心生感慨,也许曾经也有那样一个人,说过那样的话,愿意一直在原地等你,只待你一个转身便看到的距离。可此去经年,物是人非,即使人的心愿意等,也会有许多烦厌的事物跑出来不让你等,于是叹息,人生多无奈,何处话凄凉。这便有了我要拣出来的第二句,曼桢与世钧,终究是重逢了,在叔惠家里,不尴不尬的一个场景,然后他们出去吃饭,只是与许多年前不同,世钧已经需要向另一个女人作交代。他们在小包厢里想起从前的情况,于是曼桢说:我们回不去了。每每看到这句的时候总会心头一震,便替曼桢把眼泪落下来,在眼前的都已隔着千山万水,我们连刚刚过去的十八秒都无法回头,十八春,如何回得去从前!

写张爱玲,不得不提到胡兰成。我认为这个被世人唾斥的文化汉奸,却是最懂张爱玲的人,哪怕他们之间不太正式的婚姻也只维持了数年。女人才不管政治时局的风往哪个方向吹,她只需要一个懂她的人,懂她的倔强,懂她的脆弱,懂她敏感的心。胡兰成懂,这是张爱玲之幸,也是不幸。幸之难能万千人中得其一,竟能懂她;不幸之万千人中仅其一,懂她却不专情与她。红尘中,浮沉多少个梦,太匆匆,转眼又一个秋,回首半生匆匆,如梦。这一点点的痴,一丝丝的缘,纠缠了半生的情,却终也是,有缘无份罢了。

【张爱玲其人】她本名张瑛,爱玲取自英文名 Eileen 音译。系出名门,祖父是清朝名臣,祖母是李鸿章长女;青年时爱上汉奸胡兰成甘当小三终被抛弃;抗战后被批判为文化汉奸。晚年四处飘零,在美国曾搬家180多次,1995年9月8日,74岁的她孤独逝去,临终身穿赭红色旗袍,凄凉地蜷在地板上。



文艺复兴,西方科学发展的一个分水岭

□姚文标

一个稍具文明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即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印刷术,其中活字印刷术,是宋朝毕昇发明的,被誉为人类的“文明之母”。然而,至少在1943年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来中国前,我们国人没有一个知道这些事,连本国的教科书,还把活版印刷的发明,说成是荷兰人科斯特。

“谁是活版印刷术的发明者?这个问句的答语,至今尚是历史的一个疑团。但是我们大多承认,荷兰人科斯特,乃是第一个完成此术之人。”①这段话就赫然写在民国时的《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西洋史》里,此书作者陈衡哲,是当年第一批考取清华学校庚子赔款留美的女生,在美专修西洋史6年,回国后在北大执教,为中国的第一个女教授,当时连她都这么认为,何况一般的国人?

四大发明,能够冠名道姓归之于中国,实在要感谢西方的巨人。文艺复兴晚期,巨人培根于1620年完成了《新工具》一书,提到发明对人类贡献时写道:“那就是印刷、火药和磁石。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②。两百多年后,巨人马克思对三种发明的作用做了进一步阐发:“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③

当然,谁都不知道三种发明是哪个国家的。

1943年,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教授来中国考察科学技术史,发现300多年前培根所说的“三种发明”加上造纸术,原本都是中国古代发明的,这一发现公之于世,震撼了世界,极大增强了正值抗日战争的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李约瑟回到英国,继续收集资料,详细研究中国的科学技术史,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陆续出版多卷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末了,他发出了振聋发聩的疑问:“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④

这就是科学史上著名的李约瑟谜题,谜题的答案,直到大师1995年辞世,东西方也没有找出来。

面对科技史上的活版印刷术,从西方留学归来的中国学者,与从未在中国留学的西方学者,怎么会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

我国的科学技术史,在李约瑟之前,处在西方人从不关注,自己人也不在乎的境地。(我国官方编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等到1982年才姗姗迟来。)倒也事出有因,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抗日战争,一百多年间因落后总是挨打,外国人、自己人谁会重视一个落后国家的科学技术史?即使留洋的中国学者,看到了《新工具》这本科学史和哲学史上的巨著,也很难将伟大的三种发明与落后的祖国沾边。

四大发明虽是我国古人创造,然而冠名、评判及考察,皆为西方人;上世纪,本国的学术大师竟然不认得先人的发明,科学技术曾长期落在西方人后面,说起这些,身为现代中国人,我和许多人一样感同身受,愧对先人,于是,试着想解开李约瑟的科学谜题。

我把培根、马克思对三大发明的评判和李约瑟的设问链接起来,他们分别代表了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和后工业时代,内容居然是联贯的,真是巨人所见略同!现以磁石为例,看它何以成为西方科学复兴的手段?它最早记载于公元前三世纪《管子》“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⑤,因它的吸铁功能,就像慈母吸引着子孙,先贤们美其名“慈石”,又因它是铁石类,才改为磁石,并磨制出了能够指示南北方向的磁石——“司南”;通过长期不断改进,到宋朝时成为应用于航海技术的指南针,航海家们依靠它犁出了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15世纪,明朝的郑和曾七下西洋。指南针约13世纪传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航海家们掀起了大航海时代,便有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522年,麦哲伦率领的船队通过3年航行,第一次证实了地圆学说。一个明晰的地球概念,为21年后哥白尼“太阳中心说”的横空出世,提供了必要的前提,这一学说是自然科学的独立宣言。

然而,对于磁石指南的奥秘,我国古代一般认同于方家们的阴阳五行作用;文艺复兴时期晚期,英国女王的私人医生吉尔伯特通过多年研究,揭示了磁罗盘指示南北的地磁场原理,于1600年发表《论磁体》一书,奠定了地磁学基础。

上述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其中的端倪:磁石在中国1900年间,主要表现出技术上的使用功能,与重大的科学发现无缘;而到了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就成了巨人们证实、发现有关科学学说的工具、手段,自身的神秘面纱也得以真正撩开。

指南针到了西方人那里,地圆学说、地磁学说这些科学巨论的证实、发现,偏偏集中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难道是文艺复兴运动使然,她对于科学的复兴竟有如此魔力?

中世纪(约公元前4世纪-14世纪初),教会统治的欧洲窒息了人们的思想,被人称为“黑暗的中世纪”。14世纪初,诗人但丁以佛罗伦萨行政执政官的身份,担当起复兴意大利民族和文化的使命,摆脱教会的统治,他的代表作《神曲》不仅艺术成就超越了前人,主题上更是突破了教会设置的思想藩篱;另一位桂冠诗人彼特拉克更是针锋相对地指出:人性对立于神性,“人学”对立于神学,开创了人文主义,其诗集《歌集》成为打破教会思想枷锁、开启人的身心之门的代表作,他是整个文艺复兴运动的领军人物。这些人文主义作品在欧洲广泛传播,极大促进了人性和思想的解放,催生了大探索大发现的大航海时代,新大陆的发现、地圆学说的证实,便是这一时代背景下的产物。

14世纪上半叶(元末明初),中国出现了推翻元朝统治的民族复兴运动,罗贯中、施耐庵两人在自己效力的农民起义集团失败后,完成了《三国演义》、《水浒传》两部古典小说,后又出现了吴承恩的《西游记》,前者借兴复汉室名义,复兴汉民族,这些作品包含着丰富的人文元素,宣扬“忠、仁、义”等儒教核心的价值观。遗憾的是,这些作品无法掀起文化复兴,当然也未能向科学复兴转化升级。

回头看看郑和下西洋,则是在海禁的大背景下奉旨出使,莫说七下,就是十下西洋,也不见得能够自主去作环球探索远航。

由此,情况渐趋明朗:中世纪之前,中国因为拥有四大发明,执技术之鞭领先于西方;而到了文艺复兴运动,西方开始执科学之鞭领先于中国。

东、西方不同的民族,在相近的时间点,一同在复兴起跑线上起步,西方因为有了但丁、彼特拉克、哥白尼、培根等巨人,他们视复兴民族、复兴文化或复兴科学的使命为己任,经过约300年文艺复兴,努力将东方传来的技术之鞭,转化为科学之鞭,带来了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哲学等各个领域的复兴,复兴这条主线贯穿于整个文艺复兴。诚如恩格斯评价文艺复兴时说的“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产生巨人的时代”(《自然辩证法导言》)。拥有四大发明的中国,自中世纪以来,像彼特拉克、哥白尼、培根、牛顿这样的巨人迟迟难觅身影,无法将技术之鞭转化为科学之鞭,长期在民族复兴的层面踏步。联系李约瑟的那番话,恰恰点中了中国、印度这些文明发源地的要害。

综合上述,我们不难发现:文艺复兴,实则包括民族复兴和科学复兴的多重复兴。科学既反映事物的真实表相,又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它的复兴,意味着民族复兴能够循因某种规律不断向前迈进。

文艺复兴运动结束,西方顺势迈上了工业革命的快车道,掀起了新一轮复兴,直至今天,长期领跑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前沿。

当下,我们中华民族正在复兴,同样需要一个巨人辈出的时代,中国是怎么落后于西方的?文艺复兴为什么能让巨人涌现?巨人们究竟施了什么魔法,使得中国绽放的技术发明奇葩,却在西方收获科学的累累硕果?从民族复兴到科学复兴的成功,是否存在尚未被人发现的复兴规律?……这一揽子问题,我觉得有必要弄得清清楚楚,找到了准确的答案,民族复兴那个长久的心结就解开了,科学史上的李约瑟谜题自然便迎刃而解。

■新书面市

《马伯庸笑翻中国简史》

作 者: 马伯庸
出版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原作名: 五德玄奇编年史
出版年: 2015-2-1
定 价: 29.90

这是一部最精短、更生动的中国通史。“文字鬼才”马伯庸上起战国秦汉,下至晚清民国,以寥寥数笔,勾勒出中国历史的线索;打破以政治大事为纬、以帝王更替为经的写史手法,用最新颖的主题“王朝的德性”重新串联历史;穿插以马式冷幽默的犀利评点,将枯燥单调的历史真实变得新鲜有趣。

读完本书,你将在最短的时间内,轻松架构起中国历史的轮廓;在轻松、欢乐的行文中,领悟历史背后的荒唐与无奈。

《在镜头背后假装大师》

作 者: 张 滇
出版社: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鹭江出版社
出版年: 2015-1-1
定 价: 45.00

这不是一本讲解摄影技巧的书。写作的初衷,只是想聊一聊那些镜头背后的东西。摄影大师们心里在想着些什么?用镜头拍下了什么?拍下来准备做什么?你是不是也希望,自己某天也会成为若干人心目中的摄影大师?或者像本书作者一样,端起个相机,在镜头背后假装大师。

《清明上河图密码》

作 者: 冶文彪
出版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副标题: 隐藏在千古名画中的阴谋与杀局
出版年: 2015-1-1
定 价: 49.90 元

《清明上河图》描绘人物824位,牲畜60多匹,木船20多只……5米多长的画卷,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乃至整个北宋近两百年的文明与富饶。全图824位人物,每个人都有名有姓,佯装、埋伏在舟船车轿、酒肆楼阁中。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翻开本书,在小贩的叫卖声中,金、辽、西夏、高丽等国的间谍、刺客已经潜伏入画,824个人物逐一复活,只待客船穿过虹桥,就一起拉开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